



上海三联书店

视点4

吴士余 主编

曹荣湘 选编

走出囚徒困境

—— 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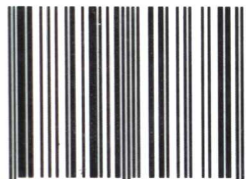
视

点

4

吴士余 主编

ISBN 7-5426-1768-0



9 787542 617682 >

定价: 18.00 元

PERSPECTIVE

视点4

吴士余 主编

曹荣湘 选编

走出囚徒困境

—— 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曹荣湘编选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视点丛书/吴士余主编)

ISBN 7-5426-1768-0

I. 走... II. 曹... III. ① 社会资本—研究② 社会制度—研究

IV. ①F0②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377 号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视点丛刊)

编 选/ 曹荣湘

责任编辑/ 刘宏伟

装帧设计/ 范峭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江苏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9.625

印 数/1—3100

ISBN7-5426-1768-0

C·38 定价 18.00 元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若说 21 世纪将是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是不为过分的。世界文化格局承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重建新的架构,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它的一个显著效应将是世界人文资源的共享,人类文化在比较、融会、批判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因此,对话、交流、创新也将是 21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题词。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文化的传统界阈将被冲破,学术文化的生态平衡将向现代形态倾斜和转变;学术思维的创造性和科学性,以及价值判断的认知理性与实践精神将更明显

地被凸现出来。

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一是对传统的、本土的文化遗产的反思与重构；二是对人类文明的世界性考量。这是因为，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衍生了诸多新的人文现象和思潮需要去考量、追踪和研究。学术文化的发展不应停留在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诠释与总结上，而是要求学者能就新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新的人文现象、人文思潮作出迅速与理性的反应；积极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变革，并作出科学的应答。因此，文化交流、对话，广采博纳，审慎辨析，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以丰富自我，使中国学术文化多一些现代意识的内涵，就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以人文学术出版为本位的上海三联书店理应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和繁荣服务。这也是我们在推出《三联评论》之后，酝酿和策划《视点》丛刊的初衷。前者意在为国内学界中坚和新锐提供学术创新的园地，后者则是介绍国外学界新的人文思潮和学术信息，为国内学人提供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企望将《三联评论》及《视点》丛书作为上海三联学术著述出版的两翼，来反映中青年学者在文化交流、对话以及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的成果。

《视点》是不定期的丛刊，强调人文学术的主题性，即每辑确定一个专题，约请专家编选国外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著述（或辑录其主要学术观点），并作综合性的评述，为求在某一学术专题方面能给读者有一个较完整的介绍。除了评介新的学术理念和信息，还将对不同文化价值判断学术考量作理性的选择；为满足青年学子对国外学术文化的了解，还将对一些新的学术语（包括跨语际的释义）作浅近的诠释。这些都将为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多层次与多元化需求提供服务，为国内学界的人文研究拓宽些学术文化的思维空

间。我们希望能跟踪当代国外学界的人文思潮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反映国外学者在这一课题上较高水准的成果。限于我们学识的肤浅,常常会留下种种遗憾。但对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去作不懈的努力和追求的。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是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在这方面,《视点》丛刊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认同的。在评介域外文化时,将清醒地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有的学术理念和课题研究会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对此,《视点》丛刊将注意它对民族文化承传的负面影响;文化交流和对话也应对域外文化资源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与取舍;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可否认,因编者学术素质的局限,在选编中难免会出现疏忽和偏差,但尽量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饱满的理性精神去对待域外人文学术研究,这应该是要努力做到的。

但有一点要强调的是,《视点》丛刊所译介的域外学术文化并非是为了照搬、效颦,也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我们的本意是为自身的学术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参照和比较,在抵御消蚀意识形态的“西化意识”的同时,积极审视、选择、吸纳有利于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建设的西方文明成果。笔者认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应包含着这种积极的出版意识。

吴士余

2001年4月

目 录

- 1 / 曹荣湘 社会资本, 公民社会: 一种元
制度分析(代前言)

· 理论经纬 ·

- 15 / [美] 韦恩·贝克 新型社会资本及其投资
23 / [美] A. 奥斯特罗姆 流行的狂热抑
或基本概念
51 / [美] 理查德·库托 领导学的新视野

· 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 ·

- 71 /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公民社会与
发展
93 / [美] 弗雷德·鲍威尔 国家、福利与公
民社会
115 / [美] J. 斯蒂格利茨 正式和非正式
的制度

129 / [美] 萨缪尔·伯勒斯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
赫尔伯特·基提斯

· 文本解读 ·

153 / [美] 林南 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

179 / [美] 爱德华·格拉泽 社会资本的投资及其收益

197 / [西] 雅森特·佛丹纳 集体行为理论的比较分析框架

· 另类诠释 ·

225 / [美] 肯尼思·阿罗 放弃“社会资本”

229 / [美] 罗伯特·索洛 论经济运行与行为模式

· 前沿领域 ·

235 / [英] 弗兰·汤克斯 信任、网络与经济

253 / [美] 亚当·B. 赛里格曼 信任与文明

271 / [美] 斯蒂芬·克拉克 增长与贫困

· 关键词 ·

295 / 曹荣湘 社会资本术语

社会资本,公民社会: 一种元制度分析(代前言)

曹荣湘

一、话语与视角的转换: 作为一个基本概念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自从布尔迪厄正式使用以来,经科尔曼和普特南的进一步应用和阐发,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理论扩展。多学科的参与、多视角的阐释,使这场争论呈现出日益激化,但也日益深入的局面。为了挖掘社会资本这一定义模糊但又不能不说是内涵丰富的、极其重要的概念,人们创造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引入了不同学科如理性选择理论、博弈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工具;理论触角则伸展到企业管理学、公民社会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甚至深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的核心,试图对资本概念加以改造,对政治传统加以重新划分。

然而,对于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意见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只是一时的狂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

即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信任能够促进经济进步,这即使是在经济学家当中也是一个早已被讨论的话题,博弈论中的“声誉效应”就是其理论基础。就网络而言,交互作用的动机并不是经济的。人们可以通过朋友或熟人网络找到工作,但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不会为了这个目的加入这些网络。尽管社会网络能够防止由不均衡的信息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但它们只是一些补充性的活动。至于规则,或者如普特南所谓的“社团身份”,则不过是马克斯·韦伯有关宗教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的命题的翻版。韦伯的命题至今还没有定论,普特南的命题是否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

在阿罗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测度性及其定义的模糊性。“测量社会交互行为的想法也许是一个陷阱,一个妄想。”而“资本”这个词有三个方面的涵义:(1)时间的延续性;(2)为了未来的收益有意地作出当前的牺牲;(3)可让渡性。社会资本作为一个资本概念,在第一方面还说得过去,我们常常说建立一种声誉或一种信任的关系。但这些东西和实物投资是不一样的,一点点信任什么用也没有。特别是第二方面不适用。社会网络的建立并非出于它们对参与者而言的经济价值的原因,因为给予社会交互行为的奖赏是内在的,即交互作用本身就是奖赏。因此,阿罗主张:“我强烈建议放弃资本的这个隐喻,以及‘社会资本’这个词。”(参看《放弃“社会资本”》)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的态度要稍微温和。他指出,那些研究和谈论社会资本的人试图理解某种难解、复杂且重要的东西:一个社会的制度和共有的态度与其经济运作方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总得有人去做;而主流经济学却清高地避开了这一任务。但索洛和阿罗一样,也认为社会资本概念不可取。“为什么要叫社会资本?

我认为,这是试图从糟糕的类比中得出确定的结论。”索洛因此提出,可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参看《论经济运行与行为模式》)

针对理论界种种反对之声,许多学者还是坚持使用社会资本概念,并试图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加以明晰的界定。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A. 奥斯特罗姆即是其中之一。她认为,把社会资本当作只是一时的狂热,是很不幸的。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所有资本都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单独一种资本是不够的。社会资本同其他资本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但会由于不使用而枯竭;(2)社会资本不容易观察和测量;(3)社会资本难以通过外部干预建立;(4)全国性和区域性政府机构对个人用来追求长期发展努力的社会资本类型和水平有重要影响。但毫无疑问,奥斯特罗姆是承认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的。她认为,人类创造的所有资本都涉及创造新的机遇、实施限制、投资可能失败的风险,以及资本运用产生危害而非收益的可能性,而这些属性也是社会资本所具有的;那些强调社会资本缺乏资本属性的人,是没有充分理解资本概念的结果。(参看《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

在奥斯特罗姆看来,把社会资本当作一种重要资本,是因为社会资本概念是理解个体如何实现合作,如何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达到更高程度的经济绩效的关键所在。这一思路和著名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2001)是一致的。可以说,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把社会资本当作一个制度分析工具,是目前社会资本理论之所以影响广泛,并日渐走向深入的主要原因。

二、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

众所周知,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存在

着两大对立的阵营。一个鼓吹自由放任,另一个则将全面的国家干预作为理想的治理形式,在 20 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这两个派别大体上界定了制度和政策的含义。争论的双方共同隐含的假设是:要么是国家,要么是市场,才能控制经济过程。此外别无选择,参与和竞争都不可能。

至于公民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一个“一般化的社会”。商业时代的到来和民主曙光的出现标志着公民社会的核心形式即社区的消失。市场、国家或仅仅是“现代化”就会消灭那些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维持着基于亲密和归属关系的治理形式的价值观。在评论美国 19 世纪 30 年代的民主文化时,自由主义者迪·托克维尔忧虑到:“每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的命运来说都是陌生者……他的孩子和朋友把他当作人类的全部;而对其他公民来说,他虽离他们很近但却看不见他们……他抚摸他们但没有感觉。”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1948]:274—275)也曾这样描写现代性:“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从这样一种现实出发,许多学者预测社区将会消失:社区的存在应归功于前现代独特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也必然会因为市场与民主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竞争而消亡。

然而,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诸如公共产品问题、搭便车问题、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都是传统经济学难以解决的(俞可平,2000)。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和政府互为替代品,不给介于其中的公民社会留下任何空间的做法,显然遇到了困境。在此背景下,人们将目光转向了这些问题经常发生的地方——社

区。许多人认为,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规则而不是其他的原因,政府既没有充分的信息,也缺乏高度的责任感以修正市场失灵。社会学加以关注的社区,解决的恰恰是那些古典的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即地方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风险分担机制的缺乏、信贷市场的不公正,以及对工作的过多和无效监督等。社区有时能做到政府和市场不能做到的事情,因为社区成员拥有关于其他成员行为、能力和需求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支持社区行为规范,并充分利用有效的、不会被通常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所困扰的保险安排。(参看《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

既然社区能够提供成功的路径以帮助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那么,社区,扩展开来就是公民社会,就形成了“第三种治理形式”。实际上,这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第三条道路”的本义(杨雪冬,2000)。从此出发,有学者认为,以合作规范为特征的公民社会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前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彻底摧毁传统公民社会对于市场发展既不充分也不必要(Aoki and Hayami, 2001)。更有学者提出了激烈的观点,认为完善市场或确保国家干预成功的努力已经破坏了不完善但还有价值的基于社区的治理体制,局限于国家和市场内的政策范式可能会起反作用。(参看《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

对于社区和公民社会的经济功能的关注,直接引发了对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概念的重视。正如青木昌彦所说,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通讯便利和公民责任意识的不断增强,这些自愿组织(也即社区和公民社会——引者注)正变得越来越活跃。自愿组织最主要的意义也许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身,而是在于服从共同考虑的成员所创造的独特的社会资本,从而以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式形成了对公共产品供应大有作用的公民规范和职业伦理(青木昌彦,2001:56)。从根本上说,由于社会资本既是一个社会学的

概念,但具有经济学属性,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对于阐发社区和公民社会的经济功能,无疑具有核心的作用。总之,正如伯勒斯与基提斯所说,“社会资本作用的突显并非因为自身的品质,而是因为其替代物存在的缺陷”。

学术界对于社区、公民社会、社会资本的重视,在社会学上又直接导致了社会资本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的结合,奥斯特罗姆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集体行动理论的目的在于解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为此,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博弈理论、治理理论等等,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几种尝试。而社会资本理论,则又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尝试之一。拿伯勒斯与基提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资本思想吸引了左派,是因为它证实了信任、宽宏大量和集体行动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重要性,并因此反对那种认为财产权明晰和竞争性市场可以成功地遏制自私动机而无须培养公民美德的思想。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陶醉于此,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在市场无法提供如地方公共物品和各种保险的领域,除了政府以外,邻里关系、家长教师协会、保龄球联合会以及其他组织也都能从事这些活动。我们世纪这些孪生幻想的破灭,为社会资本进入知识时代消除了障碍。”

三、制度分析、集体行动与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和制度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从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2001[1992]),来看,该书把制度视为政治、行政机构,从而没有对制度作出更明确的界定。从该书中,我们得到的制度只意味着在决策程序和资源配置中运作的规则,以及公共管理机构。正因为采用的是这样一种解释,制度在此只是作为恒定的中介变量起被动的作用,从而失去了阐明的价值。可

见,社会资本和制度的关系在普特南的书中还不够明朗。(参看《集体行为理论的比较分析框架》)

与普特南相比,奥斯特罗姆、伯特、青木昌彦、斯蒂格利茨和克拉克等人对制度的定义要精确得多,从而也就深入到了社会资本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内部。

奥斯特罗姆把制度理解为一套配置收益、分配报酬的规则,因为她考虑的是如何管理自治性的集体行动。由于规则协商的互动性是超越讨价还价的一种投资,因此它暗含着更多的人际关系。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制度被创生出来、去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时,人际的不平等、投入的差异、对人的不同需求的关注等等变量,都是制度所要加以考虑的。于是,社会资本自然是题中之义。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言:“基于微观基础之上的制度革新和演进,其理论上的缺失制约了人们的理解力……在自治集体的规则要求下,个体到底是如何发展其自身的社会资本的。”(Ostrom, 1995:133)

奥斯特罗姆进一步把制度、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从而把集体行动水平上的制度分析扩展到经济制度分析。她认为,以制度和因此形成的动机的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是影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作用于生产和增长的关键因素。例如,完善的市场制度产生推动私人企业家投资物质、人力和更多社会资本的動力。当这些投资与地方状态相符合时,其实质性结果就是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经济高度增长。在地方、区域和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各种公共部门,有助于个体解决市场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

从方法论上说,奥斯特罗姆是从理性选择论出发的。她首先把制度宽泛地理解为一种机制,在其中,通过向社会公开地、明确地阐发其动机来实施规则和准则。于是,这种建立在理性选择之上的新制度主义就必然关注社会资本问题,如对整合在制度内的

规则、惯例和准则的分析。奥斯特罗姆断定,精心设计制度是投资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因此,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探究支撑社会资本概念的微观基础,乃是奥斯特罗姆的中心主题。(参看《集体行为理论的比较分析框架》)

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际间创造的一种性质,它预示着知识、教育和威望的回报部分地取决于个人在市场或等级社会结构中的地位”(Burt, 1997:339)。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个人如何积累、保守或消费社会资本方面,制度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制度中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能够就个体如何管理他们的社会资本,创生出一种独特的个体行为。显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许多这样的制度,它们创制出来,就是为了抑制社会资本的过度不均衡所带来的危险,或者反过来,促进和鼓励中间人源源不断地涌现,来弥合结构洞(structure holes)。

在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中,社会资本是个核心概念。他对制度的定义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博弈规则不是外生给定的,即由政治、文化和元博弈决定的,而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的,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青木昌彦,2001:11)。由于青木昌彦把制度看成内生的、互动博弈的结果,因此,科尔曼对于社会资本的功能性定义“社会资本……包含了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它们能够促进处于该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的某些行动”(Coleman, 1990),自然引发了他的兴趣。不过,青木昌彦反对波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因为后者不是通过个体或集体有意识行动的结果,而是从过去神秘地“继承”来的。青木昌彦声称:“我们的观点却不同。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由个人投资和占有。个人为了从中获益,必须通过社会交换对此投资和维护。”(青木昌彦, 2001:257)